

論「和解」之危險性

王人傑

時下流行着一種想法，以為吾人目前所面臨的時局，已經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時局。換言之，吾人現在所處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一個緊張與對抗的時代，而是已經步入一個和解與談判的時代。因此吾人展望的將來，是一個值得樂觀的時代，大家大可高枕無憂地享受「一代和平」，而不必再恐懼戰爭的來臨，遭受戰火的洗劫。

吾人不否認，今天的世界形勢確已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局面，因為在表面上，劍拔弩張之情勢似乎不復存在，冷戰氣氛也似乎收斂了，世界各地都在進行談判與和解，因此吾人似乎沒有理由要杞人憂天，戰戰兢兢的「庸人自擾」而繼續主張與共產陣營對抗。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共產勢力的猖獗與侵襲，而有杜魯門主義對希、土給予適時的支援，尤其是馬歇爾計劃之實施，對西歐國家大力支持，深植其經濟與社會基礎，以免為共黨所乘。更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集體的武力抵抗共黨侵略勢力。在美洲則有美洲國家組織之成立，以對抗共黨的挑戰，在亞洲則有東南亞公約組織，在中部有中部公約組織。這些安全政策的實施，則有賴「圍堵政策」與「戰爭邊緣」政策之相繼運用，戰後這些措施的採用，無非是以對抗並阻遏共產侵略為目的，而這些政策之實施，無可否認的是獲得相當的成功，但是它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當時的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在軍事上是佔有絕對的優勢，此種優勢的地位，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就逐漸地發生動搖，演變至今則成為雙方力量的均衡，而在今天這一個核子時代裏，如果雙方要以戰爭來做為執行其國家政策之工具，這似乎是危險而不可能之事，對抗既不可能解決問題，那麼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改以「談判」與「和解」來代替了，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美國既然有此種認識，因此其戰後二十多年來的外交政策，就必須配合國際關係的演變而有所調整。

由於美國相信國家間敵對情勢並非一成不變，因此它就從「圍堵報復」的政策中解脫出來，而希望以談判去與敵人交往，尼克森總統在「實現和平的真實道路」一文中，曾經引用華盛頓的話說：「對特定的國家固執不移地採取『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勢不兩立的態度』，將使一個國家成為其自身

怨恨的奴隸」，基於此種認識，美國因此認為，如果在國際關係中，要把各國從對峙中解放出來，它就必須與蘇俄、毛共開展一種新的關係，在尼克森就任第二任總統時，他對於此一觀念又再度重申：「讓我們和其餘世界一同下定決心，從我們業已達成之開端前進，讓我們繼續拆除使世界陷於分隔的、敵對的牆垣，而代之以建立諒解的橋樑，由是，政府制度之間雖有深遠的歧異，而世界上之人民則能成為朋友」。美國政府既有此種信念，因此也就有一九七二年二月間尼克森之訪問中國大陸，有一九七三年二月間與毛共之宣佈互設聯絡辦事處，尼氏匪區之行，自詡是對毛共關係之一種突破，而結束了美毛之間二十多年來之仇恨與隔絕之局面，因而打開雙方交往之門，至於聯絡辦事處之設置，則是朝向關係正常化過程之一項步驟，被視為係和解之效果。美蘇關係之緩和，為美國政府視為係世界和平結構中之一項極重要因素，而為達成改善彼此關係之目的，限制雙方核武器競賽，被視為係一項決定性之步驟，因此而有一九七二年尼克森之訪俄，一九七三年布里茲涅夫之訪美，以及今年尼氏之再度訪俄，而對此一問題達成若干協議，此外，美國為表示與蘇俄和解之誠意，亦參加了自一九七三年七月召開之歐洲安全會議。

吾人以爲，領導自由世界的美國既然認為國際關係之性質有所改變，那麼它希望以「談判」來謀求和平的動機，似乎也無可厚非了，但是國際政治問題的解決並不能僅靠善意，不能僅憑一廂情願的作法，應知毛共之所以開展其笑臉外交，並非認為談判時代確實來臨，而是基於其內外因素而促成，毛共內部權力鬥爭之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外部則受到蘇俄重兵壓境之威脅，使得毛共為安撫內部與抗拒蘇俄咄咄逼人之勢，乃被迫要接受與「美帝」「和解」，其實毛共陰謀乃在分化中美關係，摧毀美國苦心經營而成之亞太安全體系，俾其得遂行各個擊破亞太自由國家之目的，而逞其侵略之野心。美國既然要以談判去代替對抗，它也就不願再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一個世界警察之角色，美國自付過去對外承諾太多，涉及範圍太廣，負擔軍費過鉅，加上越戰的拖累，造成美國國際收支之失去平衡，因此美國希望縮減它的海外承諾而發表了有名的「尼克森主義」，表示「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美國

肩負的任務固然是必不可缺，但是每個國家對於維護自己的和平，所肩負的任務同樣是必不可缺的，此種政策雖然標榜不是孤立主義的復活，而是在於更平衡的與盟邦分攤維持和平的責任，號召聚集更多的國家，更充分的從事其本身的防務，並使大國對於並非切身利益與休戚相關的衝突不應親自介入，但是此種政策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產生了孤立主義思想的趨向是無可否認的，並且在亞洲國家產生一連串的「震盪」與「驚恐」，也是事實。因此若干亞洲國家在面對着美國實施此種敵友不分的「和解」外交政策下，於徬徨失措之餘，竟然提出所謂「中立政策」以求自保，特別是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意圖使東南亞地區成爲一個「中立」區域，而要求由美、蘇、毛來共同保證此一「中立」，此種情勢之出現，主要在於聯合國對於國際爭端之解決所表現的無能，及美國政策之動搖而欲自亞洲逐步撤退。人們深知此等國家之提出「中立化」要求，主要的是由於各國內部問題所引起，東南亞各國有其特殊問題，而最大原因係來自毛共之干預與內部之顛覆。例如菲律賓境內毛共份子之暴亂，泰國北部共黨份子之騷擾，泰馬邊界之共黨游擊份子之活躍，印尼共黨份子之機再起。如今馬來西亞希望毛共來保證其國家內部之安全與東南亞地區之中立，此不僅是緣木求魚，而且無異引狼入室。印度本爲中立主義之干城，但匪印邊界武裝衝突之後，中立主義無法復存，印尼蘇卡諾亦曾大唱中立主義之曲調，結果證明亦不過自我陶醉而已，這些歷史寫下的教訓應爲亞洲自由國家所警惕而加強合作，唯有如此方是自救之道。

美國既以談判爲手段而講求與毛共之交往，其目的無非是想以毛共來牽制蘇俄，維持所謂勢力均衡，而非爲達成「緩和」之目的，而其實毛共是不配爲國際政治之一項權力中心的，是以美國之意圖不能達成其預期之目的，是不言可喻了。因此吾人以爲所謂「多元均勢外交」，不過是一種口號，一項號召，而非非一件事實，因此也就沒有改變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所以吾人只能說美國意欲擺脫世界性之重担，因此刻意創造一些權力中心，希望彼此牽制，於是在亞洲地區，美國遂將日本拖入，將毛共拉進，使其與蘇俄間相互牽制，這是美國之如意算盤。不過此一算盤並不算得準，因爲日本固然已在美國扶持之下恢復國力並壯大起來，但是日本除在經濟上有所成就外，由於其大部分原料亦均仰賴外國進口，因此其經濟結構亦非強固而有力，況且既無強有力之軍事力量爲後盾，又不肯負起國際責任來，則美國之希

望藉日本以維持均勢之目的即無法達成。如今美國雖然擺脫亞洲戰爭之羈絆而得暫時喘息，但是蘇毛在亞洲霸權之爭則愈形尖銳與激烈，因此亞洲地區之安定與均勢能否維持實在是個問題，因爲美國此種政策之基礎是建立在蘇毛衝突的形勢上，設若蘇毛交惡程度升高，而蘇俄以武力將毛共擺平，則亞洲均勢立即破壞，或者蘇俄在匪區內部培植一反毛勢力，而俟機推翻毛匪，或於毛匪死後以圖恢復匪蘇關係，任何一種形勢之形成，亞洲亦將淪爲蘇共天下，美國將如何善其後？是在美國此種權力均衡政策之運用下，亞洲自由國家應提高警覺，加強彼此合作以抵抗共黨威脅，而不應爲「和解」幌子所迷惑，如此方能自救而助人。

在此一核子時代裏，共黨國家既無法以暴力去征服自由世界，乃以「和平共存」來麻醉自由世界，在共產國家看來，和平共存並非共黨國家與自由世界勢力關係之現狀的鞏固，而是共產主義不懈地攻擊而使得自由世界接二連三敗北的一種強烈鬥爭，因此「和平共存」或「和解」，是兩種制度間鬥爭的一種特殊型態，是爲達成埋葬自由世界各國之目標的一種策略的運用，因此所謂歐洲安全會議之目的何在自然是非常明顯了，就其中之一而論，蘇俄乃企圖排擠美國力量於歐洲之外的，因爲如果歐洲在表面上緩和了，那麼美國之停留於歐洲將成爲多餘之舉，但是美國原爲北約之支柱，也是歐洲安全之保證，如果歐洲和解（形式上之和解），蘇俄大可藉機將美國勢力排除於歐陸之外，而後讓它遂行其個個擊破之伎倆。由此可見，所謂談判代替對抗，無非是自尋死路。

綜合上述，吾人以爲國際關係之發展，在形象上雖然有所變動，但是窮本追源仍然是自由與奴役、光明與黑暗、民主與極權之對抗，因此，不是我們爲共黨勢力所吞噬，我們必然要消滅共黨勢力，絕無妥協或和解之餘地。切勿以爲反共是落伍的、保守的，毛共說它們是反潮流的，這一潮流是什麼呢？那就是反共的潮流。共產主義是十九世紀時候反映當時社會病態的產物，今天二十世紀則已不同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了，時代的潮流已沖掉了那種病態與不合理的現象，如果反過來去攀附十九世紀殘餘的東西，則不爲時代潮流所允許，而才是落伍的保守的。所以要在這姑息逆流中衝出一條路來，就應提高警覺，絕不爲「和解」的偽裝所乘，隨時爭取主動，掌握變化，積極奮鬥，制敵機先，以創造偉大的勝利。